

學術著作◆大專用書

孫憲 中政 山思 之想

謝政道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孫中山之憲政思想

謝政道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孫中山之憲政思想 / 謝正道著 . - 初版. -
臺北市：五南，民 88
面； 公分.

ISBN 957-11-1926-1 (平裝)

1. 孫文主義

005.18

88013080

1R66
孫中山之憲政思想

作 者／謝政道

責任編輯／施榮華

校 對 者／董秀能

出 版 者／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登 記 號：局版台業字第 0598 號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02)27055066 (代表號)

傳 真：(02)27066100

劃 機：0106895-3

網 址：//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發 行 人／楊榮川

中部門市／五南文化廣場

總 店：台中市中區 400 中山路 2 號

電 話：(04)2260330

沙 鹿 店：台中縣沙鹿鎮 433 中正街 77 號

電 話：(04)6631635

排 版／辰皓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 版／欣緯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容大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一紜裝訂廠

中華民國 88 年 9 月初版一刷

ISBN 957-11-1926-1

基本定價 6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 目 錄 ■

緒 論 001

第一章 孫中山憲政思想之研究 009

- 第一節 孫中山所處時代背景之探討 011
- 第二節 相關文獻之歸納與分析 031
- 第三節 相關文獻之檢討 081

第二章 學者對孫中山憲政思想之詮釋 103

- 第一節 學者對「權」「能」之詮釋 105
- 第二節 學者對政權之詮釋 122
- 第三節 學者對治權之詮釋 133
- 第四節 學者對權能區分學說之綜合探討 141

第三章 孫中山憲政制度之重構 185

- 第一節 理論層次的重構 188
- 第二節 制度層次的重構 213

結 論 229

參考文獻 231

圖目次

- 圖 0-1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關係圖 003
圖 1-1 1913 年美國克利浮萊城自治機關圖 040
圖 1-2 比較憲法圖 056
圖 1-3 五權憲法圖 058
圖 1-4 治國機關圖 060
圖 1-5 政權、治權關係圖 076
圖 2-1 「政權」與「治權」之比較圖 116
圖 2-2 國民大會之分析圖 122
圖 2-3 五權分立之分析圖 134
圖 3-1 權能區分的分權結構圖 189
圖 3-2 孫中山之民權發展架構圖 210
圖 3-3 人民行使四權之流程圖 211
圖 3-4 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關係架構圖 225

表目次

表 1-1 孫中山所發表關於權能區分學說之重要文獻 012

表 2-1 孫中山對「權」「能」之定義 105

表 2-2 質詢權與監察權之比較表 164

表 3-1 孫中山對「能」的構思 190

表 3-2 「德」與「能」的關係 193

表 3-3 政權與治權的關係架構 213

■ 緒論 ■

在論及孫中山之憲政思想以前，筆者認為應先談談如何才能由孫中山的遺著中，尋出一些蛛絲馬跡，俾真正掌握其思想重心之所在，然後再提出有意義的讚揚或批評，而非在一知半解或道聽塗說的狀況下，胡亂的批評孫中山的學說理想太高，不能實踐；或一味的歌功頌德，以做為升官發財的工具。如此，就喪失了做學問的真意，也容易誤導時人對孫中山思想的真正了解。大凡，研究孫中山思想的人，常會有意或無意的犯下列的毛病：

一、孫中山的學說裡面，有許多的觀念是歷史的首創；既是首創，就無例可循。¹加上孫中山在其有生之年也未能將其思想做十分仔細的整理和闡釋，造成這樣的原因首先是孫中山太忙於革命事業的奔波，真難有空能停下來解決這些應加以補充及詮釋的問題；此外，誠如孫中山（1989a：1）在《三民主義》一文中的自序所言：「國家建設較前各書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國防計劃、外交政策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冊於思想之線索、研究之門徑，亦大略規劃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不待思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出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竟將

¹ 歷史上許多的首創或發現，大抵超乎當時人類的想法，故在當代並未能為世人所接受，直到後來的證實，才使該學說發揚光大。例如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的「太陽中心說」和哥白尼的「地動說」無不受當時多數人的排斥和為天主教會指為異端邪說，這種無例可循的學說的出現，大抵先是受到質疑後經證實，而終為世人所接受。

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毀去，殊可痛恨。」其中與其憲政思想有關的「五權憲法」與「中央政府」均在其著述之列。而《三民主義》一文雖以演講方式完成，但孫中山（1989a：1）亦在自序中說：「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為參考，只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及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足證孫中山原本是規劃著一套實踐其憲政思想的學說，只是部分毀於陳炯明叛變時的戰火，部分則在其尚未完成之前就逝世了，留下來許多關鍵性的問題，自然只能留待後續研究者藉由其遺著一點一滴的加以拼湊；其次，孫中山所遺留下來之文獻中，嚴謹且有系統的「論著」不多，大抵以「演講」、「談話」、「宣言」、或「文告」為主。而此類性質之文獻，主要是以普通百姓為訴求對象，俾配合革命宣傳的需要，因此在寫作時不免淪於淺顯易懂或具誇大效果，以期吸引群衆的向心力，導致理論往往須配合革命的需求來做調整，如此方有足夠的說服力來「喚醒民衆」。當然，這種調整的結果多少會損及理論的一貫性或造成前後矛盾的說法，而給後續研究者帶來困擾，並常常使一些研究者困惑於一些字眼的斟酌，甚而陷在其中，不能自拔，最終不免以為孫中山的學說是有矛盾，是行不通的；甚至望文生義，而將自己誤解出來的意思當做孫中山的意思，自然更是要扭曲孫中山的思想了。此外，孫中山畢竟不是專研政治學科的人，因此在大原則的掌握與架構可能尚無問題，但牽涉到分類較細且較精專的立法技術時，就難免無能為力，然而這也是為何孫中山提出「專家政治」的原因。而且以此點來責難孫中山亦屬大錯特錯，因為孫中山自革命開始，就承認自己的學識只能做大原則的規範，而細部的計劃，則有賴全國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才能達成。關於這點孫中山曾先後提到：「合上四權，共成為五權分立，這不但是各國制度上所未有，便

是學說上也不多見，可謂破天荒的政體，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至於那詳細的條理，完全的架構，要望大眾同志盡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1989c：207）、「尚望同志，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為一完善之書，」（1989a：1），便是懇請大家參與其憲政思想的規劃，而非一言堂的學說。

二、缺乏計劃去研究孫中山的思想，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思想會隨時間的改變而改變（當然也有例外），孫中山亦是如此。因此，我們在研究其思想的時候，必須要有全盤的研究計劃，時間上要由前至後，其間亦要去了解每一階段的環境因素對孫中山思想所造成的影响和轉變；當孫中山的說法在時間上有前後矛盾的時候，應以後來的說法為依據，但也應了解其內容是否言自肺腑或另有用意。例如孫中山（1989a：129）曾於民國13年8月3日說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這一段話，常為部分學者所攻詰。然從歷史層面分析這段話，其動機則是為當時的「聯俄容共」政策做辯護，以緩和黨內反對「聯俄容共」政策的力量，以避免黨的分裂。且再看看孫中山（1989c，417-8）在民國13年1月21日的演講中所說：「本黨即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均包括其中。」並繪有一圖，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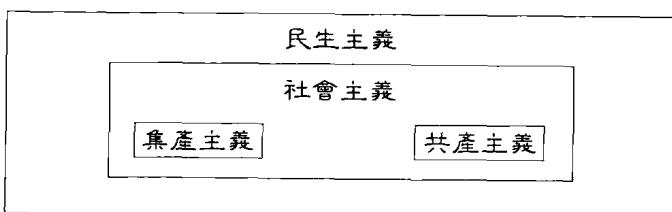


圖 0-1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關係圖

由此可知「共產主義乃包含於民生主義之中」，而非可類推成

「民生主義等於共產主義」，二者在實際上有極大的差異。換言之，孫中山晚年的主張，未必能全盤引用於政治制度的組織設計中。蓋在孫中山所有的演講及著述中，揆其內容大體可分為「政策層次」與「思想層次」兩類。前一類係針對一時政治情勢而發動，以求因時制宜，故不必拘泥於「後說優於前說」之形式。後一類則與一般學理無異，係與時俱進，晚後的主張於其思想體系中，自經過較長時間的深思熟慮及冷靜思考，所以「後說優於前說」的原則，大體上是可以成立的（有時尚須就「全體以觀」，並辨別所引用的資料，究屬孫中山親筆所撰？抑僅為演講紀錄？而在取捨上有輕重之別）。有些研究者一生窮究孫中山的思想，仍是懵懵懂懂，關鍵就在於沒有計劃，興之所起，擇段而念，這種讀書不求甚解的態度，實非做學問的態度和精神，所以念不通，是可以理解的。至於對部分僅看了孫中山《民權主義六講》便對下定論的學者，那更是無法掌握孫中山憲政思想的優劣點何在。

三、斷章取義不當所造成的偏見和誤導。其實，「斷章」並非不可，但先決條件是斷章的結果不能改變整篇文章的原來意思。例如常有學者引用孫中山（1989b：314）所言：「現就中國情形論之，以內閣制為佳。」因此就得出孫中山是主張內閣制的結論。像此種斷章取義的說法，在根本上，已扭曲孫中山的原意並誤導不知情的讀者。真正較符合原文意思的斷章應該是「至於政府之組織，有總統制度，有內閣制度之分。…現就中國情形論之，以內閣制度為佳。…以上兩項，熟善熟惡，現下正待民意所推，兩者必採其一以行之。」如果視查全文，則可知後者較前者符合孫中山的原意。此外，這一篇文章乃民國二年發表，亦是環境背景下的產物（反對袁世凱主張的總統制），自然也不能代表孫中山在後來的想法。換言之，孫中山的許多言論看似前後矛盾，但若能由歷史層面去做深入的分析，便能理解有些言論是基於當時的環

境所迫，而不得不做出的決策。

四、此外造成某些學者對孫中山誤解的原因，則是在孫中山逝世後，當政者往往爲了種種原因，將孫中山的思想學說做統一性之詮釋。例如蔣中正（1952：198）在其《三民主義的本質》一文中便強調：「我們三民主義的理論，除開總理遺教，給予我們最高的準則以外，黨中同志，雖有許多詮釋，許多發揮的著作，但是始終未能把黨的理論基礎，正確而統一的建立起來。因此衆說紛紜，議論不一。不但沒有把主義的真義，發揚光大，相反地還給主義帶來了許多困惑和曲解。這樣，黨中同志對自己已經爭吵不清，那如何還能使人民來信奉主義接受主義？過去就因爲我們自己的意見分歧，理論不一，不必等朱毛奸匪來反對我們，攻擊我們，而只在我們同志之間，自己打擊自己，就已非失敗不可的命運，何況朱毛奸匪正在我們四周伺機觀變化，我們的主義斷章取義，把我們的理論，歪曲顛倒，用其全力，要來毀滅我們革命的基礎呢？像過去本黨那樣情形，到了結果，就只有使革命的理論，更加迷惘，更加混亂了。由於這種失敗教訓的體認，可知我們今後要領導革命，完成革命，就必須要黨員言一致，纔能夠恢復榮譽，組訓民衆！」如此一來便或多或少造成了教條化、僵硬化與形式化的不良後果。這種一言堂式的論述不僅無助於孫中山思想的發展，且阻礙了孫中山思想的蓬勃發展，而填鴉式的教育方式（高中「三民主義」必修、大專「國父思想」必修）更促使原本彈性活潑的孫中山思想成爲學生的負擔與庸俗化，這都延宕了孫中山思想學術化的深度與速度。

五、將孫中山的學說思想視爲升官發財的工具和手段：我們知道，任何學說的建立，應該是用來實踐，而非用來「捧」的。實踐的結果才能知其良窳與否，進而修正或換新制度；因此，就得去了解學說的真正義涵；反之，將一個學說拿來「捧」的話，就未必要去深入了解其真正義涵。反正就視同聖經一般，一字一句皆視爲

真理、圭臬，凡事喊喊三民主義萬歲，就可治百病、除萬難，像如此重口號，輕實踐的結果，往往是原地踏步走，白費力氣。甚至部分學者更以掛羊頭賣狗肉的方式，將明明研究的是和孫中山並無相關的學說，冠以研究孫中山思想之名來發表，一時之間，孫中山成了學術領域上的全能先知，像這種旨在藉孫中山之名，壯自己之實的做法，是最容易造成讀者在觀念上的混淆及反感。李卓吾曾說：「中國人兩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兩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王亞南，1987）原因也就在此吧。但不可否認的，「捧」功雖然對整個國家的發展無所助益，卻能造就某些人升官發財的機會，但最嚴重的結果還是將孫中山神格化了。神格化的結果是神不可能犯錯，故其思想學說亦然，因此字字珠璣，句句金言，造成半個字也不能改；然而，事實是孫中山的學說的確存在著瑕疪與不足之處。孫中山是個「人」，可以是個偉人，但絕對不是神，唯有將孫中山從神的位階拉回人的位階，並採取比較客觀中立的態度來研究其學說，才能讓孫中山的學說優劣立現。

六、許多學者常質疑孫中山做為一位職業革命家，能否有足夠的時間進修？蓋革命工作的繁忙，必然對孫中山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產生排擠效應。關於這點，可由孫中山曾在回答黃昌谷的話中提到：「我幾十年以來，因為革命的事情，居無定所，每年所買書籍，讀完之後便送給朋友們去了。至於讀過了的書籍種類和數目，也記不清楚了。從買書的費用說，大概在我革命失敗的時候，每年所花的書籍費至少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時候，所花的書籍費便不大多，大概只有二、三千元。」（張篤勤，1998：15-6）從上述答話，再配合目前證實所得的資料（上海孫中山故居藏書計1932種，共5230冊，內容涉及古今中外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可推論出孫中山一生購買過大量的書籍，且部分或散失、或贈與。一般而言，算是相當豐富了，何況

上海故居的藏書只是孫中山一生所讀書籍的一部分，至於孫中山一生究竟讀過多少書籍，已經無法統計。此外，孫中山一生有幾段相對集中的讀書時間，如1896年10月至1897年7月在倫敦，1912年8月至1916年4月在東京，1918年6月至1920年11月在上海。都是在他革命事業遭受挫折的時候，所以孫中山對學問的用心是無庸置喙。

本來孫中山的憲政思想應由孫中山本人親自說明，方為上策。然此誠屬不可能的事，但研究者在採取各種研究途徑去理解孫中山思想的時候，勢必難免帶有某些主觀的價值偏見，而導致研究結果各不相同。但是最重要的應該是研究者本身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是以偏「究」全，不可認為唯有自己的解讀方式才是正確理解孫中山思想的唯一正確途徑，以免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更窄化了孫中山思想的宏觀視野。此外，有關任何史實的研究，第一手正確史料的蒐集與運用是十分重要的。誠如本文研究的重心是以孫中山之憲政思想為研究主軸，其遭遇的困難在於目前關於孫中山的創作史料之收集、整理和審定工作，一直持續進行著；許多重要史料的陸續公布與發現，常使資料分析與考證的工作時間加長，最終勉強才得以用三章的篇幅完成此書：第一章企圖藉由對孫中山憲政思想相關文獻的整理，以求證孫中山在其憲政思想的文獻，是否提供了足夠的材料，得以藉此建立完整的理論架構，進而發展出一套實際可行的憲政制度；第二章則嘗試歸納後續研究孫中山憲政思想的學者之見解與批判，俾深入探究孫中山憲政思想的問題所在；第三章則企圖經由去劣擇優與補充說明的方式，嘗試合理地重新形構孫中山的憲政思想。

第一。章

孫中山憲政思想之研究

民權發達了以後，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態度，無論如何良善皆不滿意。如果持這種態度，長此以往，不想辦法來改變，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現在世界上要改變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歐美學者只想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改變，至於怎麼樣改變的辦法，至今還沒有想出。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我的辦法，就是像瑞士學者近日的發明一樣，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近日有這種學理之發明，更足以證明我向來的主張是不錯。這是什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這個權能分別的道理，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五講》

